

人人文庫



南部非洲問題論叢

上冊

楊逢泰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楊逢泰著

南部非洲問題論叢

上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創始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創刊之初視字數多寡分爲單號及雙號兩種，五十八年七月起增加特號，迄六十八年十二月底共出版二二五一本，其中單號六五七本，雙號九〇九本，特號六八五本。除六十三年三、四兩月因紙張缺乏暫停外，每月發行十本至二十本不等。

本叢書爲王雲老所創，其選材與介紹新知倣自英國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及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以廉價普及爲主。今雲老雖已仙逝，不復主編本叢書，本館仍一本雲老遺志，繼續出版，按月發行，並力求革新內容，改進印刷，以副讀者愛護本叢書之雅意。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謹識

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一日

南部非洲問題論叢 上冊

目錄

一、葡屬非洲往何處去	一
二、美國的南部非洲政策	一七
三、轉變中的羅德西亞	二八
四、安哥拉內戰的國際背景	四〇
五、南部非洲局勢與印度洋的安全	五九
六、安哥拉戰亂面面觀	八〇
七、安哥拉戰亂餘波	九九
八、安哥拉事件後的南部非洲	一〇八
九、「分別發展」——南非的解題法則	一二四
十、北平莫斯科在南部非洲的角逐	一三六
十一、日內瓦會議和南部非洲的局勢	一五四

一、葡屬非洲往何處去

葡萄牙：非洲殖民主義的先鋒

葡萄牙爲歐洲人在非洲殖民的先鋒。早在十五世紀，亨利親王 (Prince Henry) 的探險者沿着非洲的大西洋海岸而下，尋找東方的財富和帝國的光榮。一四八二年時，已在塞內加爾、黃金海岸和剛果建立了貿易站。一四八六年，狄亞士 (Dias) 到達了開普角 (Cape Point)，一四四二年康卡爾夫 (Arzao Concalves) 將第一批黃金和奴隸從西非運到葡萄牙，可是不到一百年以前，葡萄牙才控制了非洲部分的沿海地帶，利用它的港口作爲奴隸貿易和未來的基地。十九世紀末葉，歐洲列強瓜分非洲，葡萄牙的探險者遂進入安哥拉和莫三比克的腹地，雖然葡萄牙的佔領在本世紀更遑時，遭遇到猛烈的抵抗，可是葡萄牙終於在非洲建立了一個面積大其本土二十七倍、人口大其本土二倍的非洲殖民帝國，包括南部非洲的安哥拉和莫三比克，西非的葡屬幾內亞、佛德角群島、聖多美島 (São Tomé) 以及西北非的馬德拉島 (Madera) 等地，佔非洲大陸面積百分之七。葡萄牙的統治政策通常稱爲「基督教的家長政治」 (Christian Paternalism)，其目標是移民

非洲，同時將基督教文明帶到非洲。里斯本當局採取個別同化非洲人的政策，認為它的殖民地人民是處於「社會墮落的狀態」(state of social degradation)中，因而有將非洲人造成與葡萄牙人同等的使命，可是歸化的條件甚高，非洲人獲得同化地位的為數甚微，一般而言，不會超過人口的百分之五。葡萄牙一直將海外地區視作本土的一部分，採取單一國家的結構，將殖民地行政設於里斯本，拒絕「自決」和「國協」的觀念。

葡萄牙前總理沙拉薩(Dr. 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自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六八年執政垂四十年，推行「整合政策」來維持非洲的殖民帝國。一九三〇年，葡萄牙國會通過殖民地法案(Colonial Act of 1933)，限制海外殖民地的自治權，其目的在「轉變財政和政治的自治傾向，使葡萄牙在世界上能成爲一個統一的帝國陣線」。一九三三年進一步通過「組織憲章(Organic Charter)，其主要觀念就是將海外屬地和母國整合起來，此項理想復在一九五一年的憲法中予以具體化，將海外屬地的法律地位由殖民地改爲行省(province)。一九六七年，沙拉薩在無線電訪問中說：

多種族主義(Multi-racialism)是葡萄牙創新的概念，黑色種族主義是我們概念的否定(非洲)新國家唯一成功的可能性在於我們宣佈並予以實施的不歧視和種族平等的原則，多種族社會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和心理狀態，唯有在和平與悠久傳統的支持下才能維繫不墮。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沙拉薩加強他的整合政策，以國家援助移民的方式，鼓勵葡萄牙人移

民非洲。一九六一年初，安哥拉叛變促使葡萄牙修改海外省的行政，而有一九六三年六月廿四通過的新的「海外省組織法」(Organic Act for the Overseas Provinces)賦予非洲領土較大的內政權力。

一九六九年七月，沙拉薩謝世。他的得力助手卡艾丹諾(Dr. Marcello Caetano)繼任總理，結束了沙拉薩時代。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日，新總理在國會提出修憲案，宣佈將安哥拉和莫三比克的地位改稱為邦(state)，賦予更大的自治權，但外交、國防和貿易仍爲里斯本當局的責任。卡艾丹諾總理明白的指出：此項步驟不能認爲是葡萄牙從非洲撤退的開始，他將葡萄牙防衛非洲領土的戰爭認爲是一種道德的義務，他強調：「葡萄牙並不是一種定量有形的東西，或者是一個空間或一片土地；而是一種生活方式，是某種人民，某種特定形式的民族聯合，一個不能分割而變爲烏有的祖國。」

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帝國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沒有受到嚴重的挑戰，迄今爲止，橫掃英、法、比殖民地的非洲民族主義風暴並沒有改變葡萄牙統治的決心，里斯本也沒有爲其殖民地準備獨立，今天葡萄牙在非洲正在從事三個殖民地的戰爭，葡屬非洲已變成非洲人反對所謂「殖民主義殘餘」(remnants of colonialism)的目標。

安哥拉：非洲最長的恐怖戰爭

黑色非洲民族主義不可避免的影響葡屬非洲，一九六一年一月，安哥拉北部首先發生叛亂，引起了一連串の間歇性騷動，而將安哥拉拖入長期的不安定狀態，形成南部非洲最長的恐怖戰爭。羅勃杜 (Holden Roberto) 領導的「安哥拉民族同盟」 (Union of the Peoples of Angola)，在東北部幾乎無法滲透的叢林地帶建立基地，從事游擊戰，一九六四年一月，羅勃杜正式宣佈成立安哥拉流亡政府 (Angolan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in Exile) (GRAE) 設總部於金夏沙，希望獲得國際的承認。

一九六一年初，與「安哥拉民族同盟」競爭的有「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領袖為納杜 (Augustino Neto)。這是一個由急進份子、泛非洲主義者和共產黨所組織而成，總部設在布拉薩市，因為有蘇俄、阿聯和馬利的支持，而漸佔優勢。

一九六四年，薩文比 (Jonas Savimbi) 脫離金夏沙的羅勃杜集團，組織「安哥拉獨立國民同盟」 (Uniao Nacional Para a Independencia Total de Angola)，在安哥拉的東南地區從事游擊活動，這是中共所支持的恐怖組織，此一組織以奧文班杜族 (Ovimbundu) 為基礎，是安哥拉境內由一個部落所組成的最大的游擊運動。

安哥拉恐怖戰爭最危險的時期為一九六六年中期，此時恐怖份子不但在東西區集中力量攻擊葡萄牙，並在與尚比亞東部邊境開闢新的戰線，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之間，恐怖份子曾越過重要的農業區西爾瓦普杜 (Silva Porto) 而進襲班加拉鐵道 (Benguella railway)，其後為葡軍

所逐退，恐怖活動限制在東南和東北人口稀少的地區。

安哥拉游擊運動之所以不能迅速展開是因為薩伊的莫布杜總統曾經驅逐在薩伊境內安哥拉游擊隊。此外，利用尚比亞庇護所活動的游擊組織在安哥拉東北區侵擾時，必須相當謹慎，因為目前尚比亞經濟所依賴的銅礦必須仍由橫貫安哥拉的班加拉鐵道輸送到大西洋沿岸，可是一旦坦尚鐵路完成之後，游擊隊將毫無顧忌的加強攻擊。

目前，引起葡萄牙焦慮的原因是「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於一九七二年宣佈，該組織將在安哥拉南部開闢一個新的戰線，以阻撓南非和葡萄牙在邊境康納納河（Cunene River）合作興建的水電和灌溉計劃，而康納納河工程不僅是一個經濟企業，並且是加緊控制邊境區的方法。

「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並計劃將跨越安哥拉和西南非邊境的反對白人統治的奧萬波人（Ovambo）組織起來。一九七一年底，大約有一萬二千人——西南非三分之一的勞工——舉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和較好的工作條件，「安哥拉人民解放組織」希望將衝突擴大到安哥拉南部和西南非的北部，來牽制南非的戡亂部隊使其疲於奔命。

莫三比克·南部非洲安危的樞紐

莫三比克境內的游擊運動情況頗為複雜，一九六二年初，境內三個小黨合併，組織了「莫三比克解放陣線」（Mozambique Liberation Front）（FRELIMO），中共和蘇俄均給予援助。一九六

五年六月，「解放陣線」的脫黨份子組織「莫三比克革命委員會」(Comite Revolucionario de Mozambique) (CREMO)，前者的基地設在坦尚尼亞，而後者的基地設在尚比亞，互相競爭，但莫三比克解放陣線實力比較雄厚，活動也比較劇烈。

「莫三比克解放陣線」(Mozambique Liberation Front) 於一九六四年九月在北部的尼亞沙(Niasa) 和卡布突迦杜(Cabo Delgado)地區發動武裝叛變，在孟德蘭領導之下，游擊運動在控制區域從社會和教育方面來爭取居民。

爲了應付恐怖份子的挑釁，葡萄牙除以武力進剿外，並進行重新屯墾計劃，將居民在戰略村(aldeamentos) 中予以組織起來，作爲社區和經濟的生活單位，一方面予以教育、衛生和其他服務，一方面這些戰略村可以將居民和恐怖份子隔離，一九七二年時，已有四十萬非洲人生活在這種戰略村中，葡萄牙當局在德特省(Tete)加速屯墾工作，到一九七二年底，已有二十萬人納入編制中。

對葡萄牙有利的因素是莫三比克解放陣線內部的傾軋，對於領導階層的不滿，加之對葡萄牙連年勞而無功的戰爭，不滿的情緒到一九六九年時已相當高漲，北方部落馬康德族(Maconde)和南方部落之間的忌恨在領導階層引起緊張的局勢，一九六九年三月，孟德蘭(Eduardo Mordlane)在辦公室中被郵寄的定時炸彈謀殺。

孟德蘭死後，莫三比克解放陣線由三雄領導，即貝拉港傳教士西曼哥(Uria Simango)、軍事

領袖沙莫拉 (Machel Samora) 和政治領袖山杜斯 (Marcelino dos Santos)。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莫三比克解放陣線內部的傾軋到達了新的爆炸點，在這次權力鬥爭中，山杜斯脫穎而出，成了實際掌權的人物，而西曼哥則由坦尚尼亞被逐至尚比亞。

刺死孟德蘭的人雖然始終沒有發現，可是有理由相信這是由組織中不滿份子所爲。孟德蘭遇刺後一個月，馬康德族的一位酋長卡萬丹 (Lazaro Kavandame) 向葡軍投誠。卡萬丹爲莫三比克解放陣線的元老，當此一運動的初期，他是軍事領袖，所以他的投降爲葡萄牙在莫三比克的一大突破。卡萬丹的投誠引起其他人的倣效，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八日，莫三比克葡軍總司令阿里加將軍 (Kaulza de Arriaga) 在一篇刊登於約翰紐斯堡星報 (Johnnewsbury Star) 的訪問中稱：「莫三比克智囊團中大多數的人已經脫離，很多人逃往肯亞和莫三比克，目前已有將近二十位重要的領袖已經投誠。」

一九七〇年後，莫三比克解放陣線在軍事指揮官沙莫拉領導下，積極進行破壞活動，企圖阻止桑比西河 (Zambezi River) 白沙水壩 (Cahora Bassa Dam) 國際性工程的興建。

對白沙水壩的威脅日益嚴重，引起羅德西亞和南非的關切，加速進行德特地區情形的調查，兩國領袖私下表示對葡萄牙在莫三比克境內圍堵游擊運動的能力缺乏信心。雖然莫三比克解放陣線的襲擊不能阻止水壩的興建，但是他們的活動確能使南非不安；因爲將來此一非洲最大的水利發電資源，南非將獲得最大部份的電力，所以不得不出面干涉。

莫三比克解放陣線在德特區加強活動，也將鄰國馬拉威捲入漩渦之中，班達總統採取強烈的親南非政策，可是馬拉威的國境三面受與南非敵對國家的包圍，馬拉威唯一與南非連接的道路是由莫三比克南向羅德西亞。莫三比克解放陣線經常侵擾馬拉威與羅德西亞的連繫，實際上已經阻止南非有效的援助馬拉威，而且能刺激馬拉威國內外的反班達份子採取攻勢，這些反對份子極可能與現正流亡在坦尚尼亞的季本勃 (Henry Chipembere) 聯合起來反對班達。縱令南非能夠空運武器來延長班達的統治，預期馬拉威將作激烈的改變，尤其是在這位現已年邁總統百年之後。而馬拉威地位極為重要，為游擊隊南向滲透的要隘。因此不可避免的結論是：如果南非要避免在其邊境出現一個敵對的國家和避免羅德西亞被關閉通向印度洋的道路，南非勢必要參與莫三比克的防禦。

蘇俄勢力出現的含義

位於西非的葡屬幾內亞已於一九七三年九月間片面宣佈獨立，稱為幾內亞比索。在葡屬幾內亞，歐洲的移民僅二千人左右，亦無重要的礦產，因此葡萄牙的繼續支撐是心理和象徵性的作用，幾內亞比索的喪失將被認為是葡萄牙殖民帝國崩潰的先聲。

葡萄牙在幾內亞比索的空中活動原來享有完全的自由，可是在這方面受到沒有預料到的干擾，自一九七一年開始，奈及利亞的駕駛員，以柯那克里為基地，駕駛俄國供應的米格十七，侵犯幾

內亞比索的領空。奈及利亞此舉可以一部分解釋爲對葡萄牙當年在奈及利亞內戰中，援助比亞弗拉，採取報復行動，另一個解釋是統一後的奈及利亞希望在非洲事務中扮演一個更爲重要的角色。

蘇俄海軍現在保護幾內亞佛德角非洲獨立黨在幾內亞共和國的庇護地，蘇俄海軍出現在幾內亞的領海，防止柯那克里再受到類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間，葡萄牙兩棲襲擊的行動。蘇俄此舉旨在消弭葡萄牙的作戰努力，一方面在回歸線以上和北約防衛承諾範圍之外，打擊葡萄牙，來使北約盟邦處於進退維谷的尷尬情況。這是華府決策者所關切的問題。在非洲團結組織的贊助之下，蘇俄船艦和供應的飛機不久就能結束葡萄牙在此一區域的海空優勢，作爲「反殖民主義運動」的擁護者，蘇俄可能增強其在漠南非洲的聲望和印象，來與中共對抗。

蘇俄海軍在印度洋和南大西洋的集結，亦影響葡萄牙在莫三比克和安哥拉的統治，蘇俄目前的力量雖不足以封鎖南非，但可以供應游擊組織武器。里斯本在非洲的積弱以及蘇俄在鄰接海域內的戰艦促使南非進一步加強力量，以圖填補葡萄牙力量衰微後留下來的真空。

「羅德西亞式叛變」的威脅

葡萄牙力量的式微由其與非洲殖民地的經濟關係反映出來。里斯本於一九七二年初宣佈不再負擔殖民地發展的重荷，而且製定了一項新的支付制度，實際上已將葡萄牙與其殖民地的關係置於外國的地位。根據新制度，安哥拉和莫三比克必須以葡幣或外幣，而不是以當地的貨幣來支付

葡萄牙的貨物和勞務，以免增加葡萄牙的赤字。此項新的措施對殖民地的經費建立了嚴格的管制，如果這些管制有效的實施，勢必消滅里斯本與非洲殖民地之間傳統的殖民地經濟關係。

此項新支付辦法的含意是非常深遠的。葡萄牙前總理沙拉薩於一九六三年曾主張將葡萄牙本土和海外省的經濟整合起來，現在就殖民地而言，將葡萄牙置於外國同等的地位，里斯本不啻是放棄了沙拉薩的計劃，這種經濟阻礙不可避免的結果是促使葡屬領土逐漸增加其與羅德西亞和南非的關係，而慢慢的和南部非洲的經濟整合在一起，葡萄牙的酒商、紡織業和皮革業者將失去在非洲的特權市場，一方面使莫三比克和安哥拉在經濟上逐漸獨立，這種經濟分紅的結束也會逐漸加強歐洲移居反對里斯本宗主權的態度。

移民所受到的一項重要挫折淵源於里斯本的一項信心：即如果葡萄牙要留在非洲，必須要實施社會和教育的改革，來爭取非洲人的忠誠並消滅導引叛亂的不公平的措施，可是這種旨在將非洲人轉變為黑色葡萄牙人的教育改革造成了與白人競爭工作的黑人。白人移民雖然歡迎對他們有益的改革，他們也恐懼受過教育的非洲人，如果不變成未來的顛覆份子，也會成為未來的競爭對手。

里斯本正如羅德西亞的情形一樣，在歐洲移民中面臨潛在的叛變份子，在安哥拉有二十五萬人，在莫三比克有十五萬人，他們要求更廣泛的自治權；爲了應付逐漸增高的壓力，里斯本最近實施一九七一年的憲法修改，允許里斯本和海外省之間的關係稍爲鬆懈。將安哥拉和莫三比克由

海外省轉變爲「邦」的地位，並有民選的議會，此項修憲行動表示已與沙拉薩經濟和政治整合的政策分道揚鑣。里斯本爲了安撫白人移民，要他們擔負更多的戡亂費用，可能要加速行動，作必要的措施。

里斯本的經濟措施也會促使白人移民依賴南部非洲白人政府的保護，縱令沒有相互的貿易利益，在南部非洲的白人政府因與非洲黑人有種族和經濟衝突的共同歷史淵源，而勢必聯合起來，南非抵禦非洲民族主義的軍事力量構成了一個强有力的吸鐵石，當葡屬非洲的權力逐漸集中在白人移民手中時，他們將指望南非的保護，而要求脫離里斯本。

里斯本：徘徊在非洲和歐洲之間

在非洲之外，里斯本也遭遇堅強的壓力迫它從殖民地撤退。在國內，葡萄牙社會各階層對三個殖民地戰爭有日益加深的不滿情緒。葡萄牙每年要化費其百分之四十的總預算來維持它的遠征軍，因此在農業和工業現代化方面缺乏資金，社會和教育改革也因缺乏經費而不能收預期的效果。因爲葡萄牙在歐洲國家是處於未開發之列，每年估計約有十萬人非法越過邊界到法國和德國尋找較高工資的工作，或者是逃避兵役，除開人口降低到危險點的八百六十萬人之外；這些移出的人民帶走了葡萄牙所必需的技術，里斯本爲了確保其殖民地，而採取鼓勵移民到莫三比克和安哥拉的政策，免費供應土地和交通工具，因此每年有五千人離開母國，爲了彌補人口的萎縮，政府在

一九七一年從佛德角移入一萬五千名非熟練的技術工人。這種措施反而引起葡萄牙社會的不安，發生種族的糾紛。

人口的嚴重萎縮指出了葡萄牙無力進行無限期戰爭的天生弱點，葡萄牙欲保留其非洲殖民地的致命弱點就是人力問題。從現代戰爭的標準來衡量，六千陣亡的數字並不大，可是對蕞爾小國的葡萄牙而言，代表着一種嚴重的「失血症」。

正如西歐引吸葡萄牙人民移居歐洲一樣，西歐亦在吸引葡萄牙邁向經濟整合的途徑，受到一項現代化遠景的刺激，葡萄牙新的一代的經濟學家希望參與歐洲共同市場作仲會員國，來打破侷促在伊比利安半島的經濟孤立狀態。可是軍事領袖、極端右翼的政客和在非洲投資的商人，却反對歐洲第一的看法，他們認為葡萄牙參加歐洲經濟社會將削弱葡萄牙與非洲殖民地的關係，並給予歐洲各國政府審查葡萄牙海外政策的機會。目前，葡萄牙正牽連在與丹麥、挪威和荷蘭的外交爭執之中，對以上三國援助非洲民族主義運動深表不滿。同時丹麥人已經透露：他們將積極支持將葡萄牙排斥於北約組織的行動，要求葡萄牙參加歐洲共同市場的壓力勢必加強，因此葡萄牙統治階層對保留在非洲殖民地這個問題已經開始有南轅北轍的看法。

在葡萄牙統治階層之外，出現了一個相當有組織的「武裝革命行動」(Armed Revolutionary Action)的地下組織，主張在葡萄牙進行社會和政治改革，和非洲殖民地的獨立。一九七一年春天，「武裝革命行動」發動了一項廣泛的破損活動，他們破爆船舶、飛機和通訊中心，並破壞北

約組織的設施。葡萄牙警察雖然經常出動，逮捕大批活動份子，無法抑止這一秘密的反對組織，政府官員揚言國內已出現真正的敵人。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卡艾丹諾總理要求國會宣佈一項「顛覆狀態」，授權政府嚴厲處理批評份子。

亞速爾協定：美國對葡政策的象徵

美國對葡萄牙政策是受各方面牽制的結果，左翼份子和自由主義者贊成對葡萄牙採取強硬的行動，而保守派人士注意歐洲和冷戰的態勢，而支持葡萄牙，美國對葡政策所受的一項特殊的壓力導源於亞速爾群島（Azores）的基地。原來，美國與葡萄牙曾於一九五一年訂立一項協定，規定美國可以在亞速爾進行海空軍設施，戰時可以利用這些設備；爲期九年，但沒有租約。

一九六二年，沙拉薩總理抨擊華盛頓「直言無諱的反殖民政策」，宣稱：「葡萄牙正在非洲從事一個困難而昂貴的戰爭，並不是沒有同盟，而是沒有盟友。」一九六六年，他仍然憤慨地表示：他雖然不能將美國人逐出亞速爾群島，他却不願簽訂一個正式協定，直到華盛頓「改變政策」爲止。里斯本於一九六九年一月才要求談判，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卡艾丹諾總理終於與美國談判了一個新的亞速爾基地協定，並且宣稱：「此項條約是一件政治行爲，兩國利益的團結在此一行爲中予以承認。也是爲了團結的名義，我們將一項採取行動的工具交於我們美國朋友使用，美國朋友也是我們的盟邦。」華盛頓官員則強調：新的亞速爾協定並不代表着美國長遠以來支持葡屬殖